

#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利益满足分析

## ——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例

高 斐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认同与其利益的满足息息相关,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对农民的政治认同发挥作用,其中经济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物质前提,影响政治认同的状态;政治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民主基础,影响政治认同的形成方式;文化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动力,影响政治认同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的政治认同达到一次高峰,根本原因是农民的利益需求得到满足。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需求会逐渐提升并在影响农民政治认同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农民 政治认同 利益 新中国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15)03-0183-06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5.03.028

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认同问题一直是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农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农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关乎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而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是利益,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选择更多是基于对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考量。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和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归根结底都与农民的利益问题息息相关。本文尝试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三个层面对影响政治认同的利益因素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 一、利益满足:政治认同的根本动因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sup>①</sup>,“‘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sup>②</sup>。人们的一切思想

和行为都可以从其与利益的关系中找到原因。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政治行为等要素,是一个从意识层面的心理归属到实践层面的行为支持的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发挥着支配和主导作用,人们政治心理的形成和政治行为的产生来自于人们的利益需求。

利益按照客观内容可以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它们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对政治认同发挥影响作用。

第一,经济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物质前提,影响政治认同的状态,即“认同”还是“不认同”。经济利益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满足人们经济需要的生产成果,经济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物质动因。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切社会发展的

因素中,经济因素是整个社会生活和所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力量和最终源泉。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sup>③</sup>由此可见,物质生活资料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改善经济生活条件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目的。他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sup>④</sup>。也就是说,获取经济利益是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根本动机和根本目的,经济利益的满足是建立政治认同的必要前提,只有经济利益得到满足,才能建立起“认同”,而经济利益得不到满足则会引发“不认同”,表现为对政治体系的负面评价和不支持,甚至是抵抗。但经济利益的满足不是政治认同的充分条件,并非经济利益满足的程度越高政治认同度就越高,政治认同度的提高还需要其他层次的利益满足。

第二,政治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民主基础,影响政治认同的形成方式,即“积极认同”还是“消极认同”。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实现经济利益的过程中需要以一定的政治上层建筑作为保障,就产生了政治需要,“人们的政治需要通过一定的政治活动,经过一定的政治关系的过滤最终得到满足,这就是政治利益,政治利益体现了一定的政治关系”<sup>⑤</sup>。政治利益的获取过程是一个提高政治认知水平和政治参与度的过程,也是增进对政治系统的了解和信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培养的民主意识和所获取的民主权利是政治意识健康发展和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升的必要条件,有利于形成“积极认同”,即认同主体发自内心而自觉产生的认同。当政治利益不能得到很好满足的时候只能形成基于制度等外力作用下的“消极认同”,即“不情愿的或不自觉的顺从”。<sup>⑥</sup>

第三,文化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动力,影响政治认同的内容,即“理性认同”还是“盲目认

同”。文化利益在社会利益结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文化利益的实现可以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丰富人们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世界。政治学家的研究表明,文化程度高的人,政治知识更加丰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更高,主体意识更强,对政治体系更能形成比较客观的评价和正确的态度,从而形成理性认同,即经过理性思考与判断而形成的内容合理健康的认同,一般是积极主动的认同。<sup>⑦</sup>而文化程度低的人由于认知能力有限,一般容易产生盲目认同,即认同主体自身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和政治主张,具有盲从性。因此,文化利益可以通过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提高其对政治体系认知和评价的客观性;通过丰富文化生活,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有利于培养理性政治认同。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基于利益满足的政治认同分析

笔者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即1949年至1952年,农民基于利益满足的政治认同状况进行分析,在这个时期,农民的政治认同达到了一次高峰,其根本原因是农民各方面的利益需求得到了合理满足。

### (一) 生活改观:农民经济利益的满足与政治认同的建立

旧中国由于土地占有的不公平,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需要交纳高额地租,同时还要负担各种苛捐杂税,生活极为困苦,时时面临生存危机。因此,农民最大的经济利益需求就是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从中获取了极大的经济利益,开始建立对新政权的认同。

第一,贫苦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农村其他阶层各得其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已经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继续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在广大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到1952年底,全国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关系。土地改革后,农民不再为地主劳动,

不再交租了。通过土地改革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0%到70%。<sup>⑧</sup>与此同时,这次土地改革与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不同,采取了保存富农经济、提高小土地出租者保留土地的标准、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进一步限制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范围等政策和措施,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农村各个阶层的经济利益,协调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消除了他们的种种顾虑,有利于减少土地改革的压力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进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同。这虽然对贫雇农的经济利益会造成一定影响,但影响不是太大,因为富农经济在旧中国是很微弱的,仅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公地一般仍能基本上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

第二 农民税负减轻。为解决农业税收方面存在的问题,政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1950年新解放区夏征公粮的决定》、《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关于1951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关于1952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等文件,不断调整和完善农业税收政策,废除了旧制度下的一切苛捐杂税,使农业税收既取之于民,又注意节省民力,充分发挥了农业税收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照顾了贫困农民的疾苦,维护了各阶层农民的利益,改善了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

第三 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民收入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三年当中农民的货币收入逐年增加,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将近80%;粮食收入的增加超过24%。<sup>⑨</sup>二是农民购买力提高,从1949年到1952年,农民人均购买力增加了70%多。三是农民生活出现富余,多数农民还了欠账,买了一些牲口和农具,并且穿新衣、盖新房,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的改善使他们的经济利益获得了极大满足。

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是在国家主导下对农村经济资源所进行的一次重新分配,在这场运动中,得到好处的是绝大多数穷人,而失去利益的是极少数富人。通过这场运动,新政权获得了农民的认同和信赖,极大地提升了党和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威信,新政权在农村积累了相当的民意基础,获得了农民广泛的政治认同。<sup>⑩</sup>农民称赞党的

土地改革政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爱国增产运动中,积极交纳爱国公粮,这反映了农民追求新生活、认同新政权的心理状态。

(二) 当家作主:农民政治利益的满足与积极认同的形成

旧中国农民在封建政治体制下,政治地位十分低下。农民对政治充满麻木感和疏离感,他们认为自己注定就是被统治、被奴役的对象,所以在官吏面前表现出顺从和恐惧,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行民主改革,提高农民政治地位,维护农民的政治利益,为农民形成积极认同奠定了民主基础。

第一 农民在政治上“翻身”。土地改革开始时,进行了阶级成分划分,改变了农村社会原有权力结构、阶级与身份地位的认知评价,开始以阶级身份指标来区分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地主、富农阶级从农村社会的上层人物变为社会的底层。而原先处在社会底层的贫雇农成为农村新的主权阶级,获得了政治地位的提升和占有各种资源的优先权。他们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通过从“推翻”地主阶级,体验到“翻身”的喜悦,“农民”这一称谓成为新中国初期令人自豪和骄傲的身份,出身贫农成为明显的政治优势。

第二 农民享有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提出并采取措施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首先,各地成立了乡村基层群众性组织——农民协会,保护雇农、贫农、中农的利益,为他们提供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的平台。农民协会不仅成为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的领导机构和执行机关,也成为农民执掌农村政权的主要组织形式和农村政治生活的中心,有关农民利益的事宜基本上都要经过农民协会委员会或农民代表大会讨论。农民通过参加农民协会参与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变革和基层政权更替中,开始在乡村政治中占据优势。同时,农村还新组建了民兵、妇联、青年团、少先队等群众组织,这些组织的主体都是贫苦农民。在土地改革中,通过召开妇代会、青代会、人代会等,宣传土地改革政策,充分调动这些组织代表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展开串联,形成了一支较强的战斗力量,起到了先锋作用。其次,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普选,以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的选举程序、选举方法,选举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虽然由于农民的民主意识不强,农民的选举是一种上级机关和干部主导型的选举,但民主选举体现了对农民民主权利的尊重和保障。

第三,农民成为政治骨干。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保甲制,建立乡级基层民主政权,在土地改革中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被党组织吸收到乡、村等基层政权担任领导职务,成为取代传统乡绅的新的乡村政治领导者和管理者。农民开始当家作主人。农民中最贫苦、最受压迫、成分纯洁的优秀分子成为党选拔和培养的对象,成为群众中的核心人物。

随着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瓦解,农民在打倒地主和推翻宗族统治的过程中,在抒发遭受政治压迫的无奈和愤怒之情时,产生集体情感的共鸣,他们的阶级意识被唤醒了。随着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翻覆及其所带来的利益关系的改变,农民的思想政治观念经受了一次洗礼,开始将阶级界限视为划分敌我友的最高标准,将阶级话语作为乡村社会的主流话语。他们开始质疑和重新审视旧社会的利益格局和政治秩序,深刻感受到了人民政权的伟大,也消除了原来的“怕变天”的思想;他们对党和政府充满了信心与期待,以更加主动而乐观的态度介入到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和乡村民主政权建设中,形成了对新政权的积极认同。农民积极参加农民协会,协会会员仅“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大行政区即达8800余万人,其中妇女约占30%左右”<sup>⑪</sup>;农民踊跃参加选举,据统计,在全国区、乡基层选举中,参加投票的选民有2.78亿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8%,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566.9万名。<sup>⑫</sup>农民还积极担任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并且一般都能努力工作,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这些都反映出农民政治参与的增加,而政治参与本身即是积极政治认同的重要表现。

(三) 精神解放:农民文化利益的满足与理性认同的萌生

新中国成立前,广大农村地区文化发展非常落后,很难看到文化机构和文化设施,文盲几乎占到95%以上,求神拜佛等封建迷信活动盛行。而广大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获得解放之后,产生了学习文化、解放身心、提高素质的愿望与要求。新

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农民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保障农民的文化利益,促进了农民理性认同的萌生。

第一,农民识字率提高。为了迅速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组织地开展了识字扫盲运动。1950年12月政务院批准并转发的《教育部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中提出,“凡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生活已初步改善的老区,首先推行识字运动,逐渐减少文盲”,决定继续将冬学作为广泛动员农民学习的一种方式,同时举办农民业余学校并辅之以各种分散形式的识字班或小组(如与生产相结合的地头小组,与生活相应的炕头小组等形式)<sup>⑬</sup>。广大农民积极响应,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并广泛推行“速成识字法”,改变了落后的文化面貌。

第二,学校教育“向工农开门”。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发出了“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的号召。1952年,教育部作出规定,中等学校工农子女入学比例,老解放区争取达到60%—70%,新区争取达到30%—50%。学生的成分迅速发生变化。过去上学的大都是地主、富农的子弟;土改后,贫雇农子弟大量涌入学校,得到了学习的权利。例如,广西1951年贫雇农子弟入学人数为154000余人,1952年上半年即增加933000余人,增加了将近六倍;福建贫雇农、中农子弟共750233人,占学生总数的72%,比1950年增加了三倍。<sup>⑭</sup>

第三,农民文化生活丰富。在文艺必须服务于工农兵的政策指导下,报刊图书、电影戏剧、有线广播等都以更加通俗化的形式走进寻常百姓家。不少村庄建起了小型图书馆,还有一些安装了收音机。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建立了各种文娱组织,如秧歌队、农村剧团等,自编、自演、自唱、自乐,以各种各样的娱乐形式,来表达他们欢快的心情。

新中国初期的农村文化建设,使农民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解放了封建禁锢的思想,并开始从文化源泉中感受精神力量,他们感到这个国家是新的、这个社会是新的、自己也是新的,在这种认识中他们找到了归属感和认同感。与此同时,伴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农民

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赌博、抽鸦片、游手好闲、包办婚姻等原来在农村中占据主导的遗风陋俗和封建迷信思想逐渐淡化, “劳动光荣”的新的道德标准和积极向上的社会新风尚开始形成。“学文化, 开脑筋, 要当新中国的建设人”成为农民的普遍口号。农民的理性认同开始萌生, 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当然, 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和客观条件的限制, 以及农民主观认识的局限性, 对农民文化利益的满足是有限度的, 农民仍然是社会中文化素质较低的群体, 他们的政治意识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 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政治认同中理性意识的萌生。

总之,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构建了新的政治格局和利益格局, 农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 改善了农民的生存状况, 提升了农民的社会地位, 建立了他们对国家、政党、领袖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如果说农民对近代专制政权重建乡村的种种努力和作为无动于衷的话, 那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新中国的实践则是满腔热忱, 全身心地投入,<sup>⑤</sup> 从而实现了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民政治认同的同构。

### 三、农民利益满足与政治认同关系之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基于利益满足而建立政治认同的历史经验揭示了农民利益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如下内在关系:

第一, 农民利益的满足是建立政治认同的基础。“农民由于传统自然经济养成的习惯, 轻易不相信各种许诺, 必须有看得见的利益才愿意为之奋斗。事实上, 农民革命的阶级觉悟或自觉性, 也是在得到了利益实惠时才树立起来的。”<sup>⑥</sup> 农民对现实利益的感受和满足是他们建立政治认同的根本动力。农民利益实现得越充分, 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就越拥护、越支持。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利益的满足与农民的政治认同形成了双向互动传输, 在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中, 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都得以最大程度的实现。中国共产党通过满足农民利益所获得的政治认同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同时也为农民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

根本宗旨所在。

第二, 农民各方面利益的满足形成了增强政治认同的合力。农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 在农民政治认同的构建中共同发挥作用。经济利益关系到农民的物质需求, 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是根本, 是政治认同形成的最直接原因。政治利益关系到农民的政治需求, 解决农民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等问题是核心, 是维护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的保障, 是积极政治认同形成的关键因素, 其中政治参与的增加本身也是积极政治认同的表现。文化利益关系到农民的精神需求, 解决农民的精神生活问题是利益的最高形式, 是农民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在精神生活领域的深层扩展, 是理性政治认同形成的精神文化要素。<sup>⑦</sup> 农民对利益的追求一般也遵循着从经济利益到政治利益, 再到文化利益不断上升的规律, 与之相应的是, 基于不同层次利益的满足, 农民的政治认同也是一个从“认同”到“积极认同”再到“理性认同”不断增强的跃升过程。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需求会逐渐提升并在影响农民政治认同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正如学者贺雪峰等所指出的“当前的农民问题, 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 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 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 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sup>⑧</sup> 因此, 对农民利益需求的满足要从农民自身出发, 才能植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结构之中, 才能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和认同。

第三, 需要指出的是, 新中国成立初期, 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 经济发展比较落后, 所以对农民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的满足是有限的, 只是与旧中国相比农民获得了更大的权益, 而当时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农民的脱贫致富和现代民主意识的培育。所以他们的政治认同中虽然开始萌生理性意识, 但并非是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体现, 很大程度上是“臣民文化”甚至是“村民文化”的体现, 非理性成分还占据主导。他们对复杂的政治系统和政治机制的运行存在简单化的片面理解, 即将利益的获取和生活的变迁归功于毛主席个人, 这样他们的政治认同集中表现为领袖认同。马克思曾精辟地分析过小农的政治思想特征, 他指出, 农民“不能代表自己, 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

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sup>⑨</sup>。这种认同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因此,只有改变落后的生产力,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为实现农民利益需求、引导其利益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保障,才能促进农民政治认同从消极认同向积极认同、从盲目认同向理性认同转变。

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分化加剧,只有建立合理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和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才能不断满足农民日益提升的利益需求,推动农民现代政治心理和民主政治意识的健康发展,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而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7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50页。

⑤ 王伟光《利益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

⑥ 孔德永《政治认同的类型、特征与功能》,载于《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

⑦ 胡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西南交通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7—28页。

⑧⑩⑫ 廖鲁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来的伟大成就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载于1952年9月28日《人民日报》。

⑨ 转引自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68、569页。

⑪ 牟成文《中国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以鄂东A村为个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⑬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⑭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27—428页。

⑮ 刘娅《解体与重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7页。

⑯ 孙津《中国农民与中国现代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⑰ 陈晓莉《政治文明视域中的农民政治参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⑱ 转引自孔德永《传统人伦关系与转型期乡村基层政治运作——以南镇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

⑲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7页。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文思]